

# 知識技藝與生命歷程

何明修\*



在 1959 年，美國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出版了膾炙人口的《社會學想像》一書。他抨擊當時兩種社會學研究取向，亦即是空洞的純理論探討與抽離實際脈絡的統計研究。Mills 認為，從古典時期以來的社會學就將是關切人類社會生活的種種困境。要能提出有力的解答，社會學就是打破「方法的拜物教」(fetishism of Method)，彷彿只要採用了某種特定的研究技巧，任何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相對於此，Mills 將社會學視為一門「知識技藝」(intellectual craftsmanship)，也就是一種附著研究者身上、無法與其生命脈絡脫離的探索能力。技藝的養成需要歲月與努力的投入，而且往往是與技藝實行者的生命緊密連結。古今許多傳說都用高度戲劇化的故事表達了這個道理，例如鑄劍匠為了打造一把最鋒利的刀器，不惜將血肉之軀投入煉爐之中，或者是那位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痴情的希臘工匠 Pygmalion，他愛上了自己創造出來的塑像。這些傳說故事所揭露的道理在於，技藝最高的境界即是研究者與作品的融合為一。

然而，有餘裕長期關注某一項知識議題，甚至能投注自己的一段生命歷程，畢竟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事實上，每個人的境遇卻無法被事先規劃，種種偶發的轉折帶來了沒有料想的機會與挑戰。就這一點，我可以想到最戲劇化的例子大概就是 Daniel P. Aldrich。在 2004 年 7 月，他剛拿得了 Tulane 大學的教職，一家人搬到紐奧良。一個多月之後，Katrina 颶風來襲，他們逃往德州避難，回來之後才發現剛安頓好的家園已經完全面目全非了。就如同許多紐奧良人一樣，Aldrich 發現聯邦與地方政府完全幫不上忙，他們只能透過朋友、朋友的朋友等人際網絡之協助，走出災難的衝擊。這樣受難經驗，讓原先研究環境爭議的 Aldrich 轉向關注災難社會學，而他所切入的角度就是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如何有助於災後的重建工作。在 2012 年，Aldrich 出版了 *Building Resilience: Social Capital in Post-Disaster Recovery*，該書已經成為了災難社會學必讀的經典。

## 一、探討臺灣勞工階級的形成

在 2014 年，我出版了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一書。解嚴之後勞工抗議風潮帶動了臺灣勞工研究的傳統，奠基在既有的研究作品，我進而探討兩個主要問題：(1) 在長期的戒嚴體制下，勞工階級是如何因應經濟剝削與政治高壓？(2) 自主工運的風潮如何隨著民主的建立而逐漸制度化，甚至是保守化？

我試圖延伸歷史考察的縱深，將觀察起點回歸到戰後的 1945 年。這本書聚焦於煉油廠工人與糖廠工人之個案，他們都是日本殖民地工業化的產物，並在戰後成為國營事業員工，經歷了相同的族群壓迫、黨國體制進駐、內部勞動市場、政治自由化等環境的衝擊。

該書的理論參考架構是來自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提問，「勞工階級形構」(working class formation) 的核心議題在於：隨著越來越多勞動者落入無產階級的行列，他們是否可能產生一股強大的反對運動，以扭轉他們作為一個集體所面對的依賴情境。這也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無產者如何形構成一個階級」(proletariats into a class)。我採取歷史制度論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的觀點，重新思考階級團結（class solidarity）與抵抗（resistance）的概念。目前盛行的文化馬克思主義，重視論述、語言、觀念如何形塑階級的共同感；相對此於，我認為團結的社會基礎最終還是取決於各種形形色色的社會規則或制度。而且，考察一群勞工是否有內聚力時，同時也要重視分化他們的種種力量，例如不同的族群、黨派、職位等。換言之，階級內的分化（intra-class divide）與階級間的分化（interclass divide）同樣重要，都有引發勞工抗爭的可能。其次，我也試圖擴大抵抗的定義，勞工抵抗不能只局限在於那些有明確階級意識引導、或是具有社會主義理念的公開抗爭。從 James Scott 的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觀念出發，我提出了一組進取性／防衛性、隱蔽性／公開性、獲取性／生成性、競爭性／互助性的分類架構，來分析臺灣戰後勞工所採取各種抵抗策略。

## 二、機緣與轉折

我的個人故事沒有 Aldrich 那麼具有驚心動魄；然而，回首來看，我為何出版了一本關於煉油廠與糖廠工人的專書，也是因為許多的機緣與巧合。

在 1999 年底，我完成了環境運動博士論文的草稿，在等最後口試的空檔，勞工陣線找我去幫忙石油工會選舉。我在高雄煉油廠待了三個多星期，晚上睡在工會幹部的家裡，白天則在工會辦公室製作文宣，因此有機會深入觀察當初號稱是「工運火車頭」的工會運作。在那場選舉中，自主工會的勢力完全擊潰國民黨黨部所推派的候選人，包辦了全部 36 席代表。沒有多久，臺灣發生了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首度取得中央執政。事後回想，我似乎在某個特定場域觀察到這場重大的歷史變革。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有一年的時間，我是過著「週休六日」的日子，因為我沒有申請到教職，也沒有拿到博士後，在東吳大學兼了一學年的課。在那時，我參與了石油工會的石油法工作小組，進一步了解面臨民營化與自由化威脅的勞工心聲。

在 2001 年，位於嘉義大林的南華大學給了我人生第一份全職工作，讓我有機會走上學術的生涯。由於地緣的關係，我開始認識當地退休糖廠員工，在他們的熱心協助下，我逐漸理解臺灣糖業的榮光與哀傷，以及糖廠勞工所承擔的種種歷史包袱。在 2009 年，我正要由中山轉任臺大，那時也是研究勞工的美國社會學前會長 Michael Burawoy 前來臺灣。在一場中山的演講之後，我帶 Michael 參觀了煉油廠，之後我們一同搭高鐵回臺北。在那旅程，



我們聊了一個半小時，Michael 得知我有寫書的計畫，他鼓勵我一定要堅持到底。看來永遠樂觀開朗的 Michael 說，資料都收齊了，六個月應可以寫完書稿。那時我心裡在想，怎麼可能那麼快？不過，等到 2011 年底我終於下定決心，真的是用半年的時間就搞定初稿了，聯絡出版社、審查、修改、校稿反而花了更久的時間。

事後回想，自己是一個幸運的社會學家，我得好好感謝那些沒有意料到的機緣與轉折。回到 Mills 的知識技藝與生命的關聯性，我認為這樣的看法還是十分有意義的，畢竟學術知識的探索還是得回歸到每個研究者內心最深切的提問，而研究的目的不外乎是提出一套能夠讓自己釋懷的解答。只是我們通常很難先將生活安頓之後，再來全心全意地投入知識探索，鍛鍊自己的技藝。就像是大海上的船舶，我們只能一邊航行，一邊解決突發的狀況。從這個角度來看，生命歷程上的停頓與歧路都會是有意義的，只要我們能好好珍惜，這些機緣都是提供磨練知識技藝的契機。